

文学与启蒙

《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 著

WENXUEYUQIMENG
XINQINGNIAN YU XINWENXUE
YANJIU



文学与启蒙

《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 著

WENXUEYUQIMENG
XINQINGNIAN YU XINWENXUE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王桂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04-9175-0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180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启蒙”首先是一个高深的哲学命题。在“什么是启蒙”的逻辑原点上，集结了一大批现代智者的精审思辨，由此会聚的“时代精神”曾波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次，启蒙也是一个实践命题，在“怎样启蒙”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历史境遇、不同思想导向乃至不同国别的丰富样态和相关后果。与之相一致，人们对于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也首先是在哲学的、思想的层面上进行，从而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反思”的重要维度以及现代思想的累积与跃迁。此外，启蒙还是个文学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中国的思想启蒙在世界性家族谱系中构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种差”。在中国历史的现代进程中，每一次思想启蒙浪潮的兴起——无论是近代以“新民”为主题的启蒙，还是五四以“思想革命”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抑或20世纪“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动力的新启蒙，无不以文学作为首义和先导。启蒙大潮必然鼓荡文学之浪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规律”。对于思想启蒙与文学之间波起浪涌、互相鼓荡的关系，近代启蒙先驱梁启超做过如下表达：“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亦如是说：“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

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具有代际性差异的启蒙者们对于启蒙与文学关系的认定竟如此相似！且不说这种言之凿凿、不容商榷的表述带有多大的情绪特征和虚拟成分，但是就思想启蒙与文学之间共生共荣的关系而言，却构成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诚然，文学是启蒙者找到的最有力、最有效的思想革命工具，但是文学并不仅仅是枯燥坚硬的思想读本，确切地说，中国的“启蒙”是由文学的千丝与思想的万缕共同编织成的精神织品，无论是抽去了思想的纬线还是拆掉了文学的经线，都会破坏这一历史图景的完整与斑斓。因此，“启蒙”除了哲学的高度、思想的厚度，还带着文学的温度，这种温度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现代文明窃火者们“煮自己的肉”（鲁迅语）发出的光和热。创生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的中国新文学是摒弃了消闲，放逐了轻松，郁积着痛苦，飞溅着血和泪的审美样态，启蒙构成了文学的生命之重，文学成为启蒙的审美表达，二者以互相创造、彼此发明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现代嬗变。因此，理解新文学乃至理解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个性气质，必须要正视启蒙思想的内在型构力量，同样，考察思想启蒙乃至追寻整个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也必须面对思想的审美之维。

本书所论及的即是五四新文学场域中的思想启蒙，或者说，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对思想启蒙所做的一次精神现象学考察。在这次精神考辨中，笔者力图拆解一种整齐的系统性建构所带来的便利和遮蔽，直接面对一个个历史故事、一处处历史细节，恢复历史久被体系征服的丰富性，释放历史在悖论、矛盾、断裂、偶然中所积蓄的张力与能量。为此，笔者所选取的是一个具体而微却带有历史原生态色彩的文本——《新青年》，并以此作为支点，从一个更为切近、更为浓缩的全息语境中瞻望五四时代的精神风貌，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和影。

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思想启蒙的历史流程中回溯文学革命发生的来龙去脉。本章所

选取的是与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发生直接相关的三种杂志——《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甲寅》和两个时代——前五四时代与五四时代。启蒙主将对于启蒙策略的调整既成为划分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也构成连接两个时代的转捩点和接榫点，文学正是在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历史连动效应中从一个无意识的“点缀品”变成思想启蒙的“必需品”，被提上了革命的议事日程。同时，分辨文学革命的“有意”与“无意”，亦是澄清《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承继说”、“先导说”等惯性误解的关键，确证“文学革命”乃是《新青年》独擅的历史光荣。考察交错于“两个时代”的启蒙者——梁启超与陈独秀对于戏曲改良和革命的曲折态度，亦可明辨与启蒙运动始终相伴生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如“改良与革命的名与实”、“理与势的强与弱”、“启蒙话语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落差”，等等。

二是从文学革命发生的原生态语境——《新青年》（《青年杂志》）考察新文学的创生过程以及新文学经典的确立规则。从总体战略上看，新文学的创生从无到有、从理论提倡落实为创作实践，文学翻译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毋宁说，新文学创生是一个翻译先行的过程。而具体到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役——白话诗运动而言，其创生的原动力则在于发掘白话固有的诗性潜能。新文学从诞生到确立，“伟大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关键程序，回到新文学的初始成长语境——《新青年》，便可清晰见到经典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支撑体系，一方面是《狂人日记》在一个“思想大于形式”的场域中被建构为经典；另一方面则是早于《狂人日记》的《一日》则被去除了“时间”上的“开端意义”，失去了“被经典”的资格。

三是在“思想”与“审美”的互织与共融中解析启蒙与文学构成的独特景观。“思想”曾经被认定为“审美”的异在性因素，文学的思想史、精神史分析也被看做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且是造成对文学审美的强制与割裂的研究。但这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从思想革命中孕育而生又主动承载着启蒙使命的中国新文学而言，思想史、精神史的解读不但不是外部研究，恰恰是最为内部的审美方式。五四思想启蒙者几乎都身兼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文学是他们找到的最有力的启蒙工具，

而受过五四洗礼的新文学家也大多有着自觉的启蒙情怀，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恰恰说明了启蒙与文学深层的精神关联，因此，把“思想”作为五四新文学“天生”的美学要素和精神气质也许并不为过。但是，文学并非坚硬而枯燥的思想读本，终究是以感性审美的方式呈现出的思想之光。因此，在一系列典型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东/西、新/旧、古/今、死/活……）中，文学一方面分享着这一时代性的二元运思模式，另一方面又以审美的方式诉说着启蒙主体在情与理之间的缱绻与决绝，从而构成了诗与思的张力文本。

四是从历史的视角反思启蒙话语。所谓“反思”并不等于一种单向度的批判，理应是对“洞察与不见”的双边考察。启蒙的“思想之光”和“历史暗影”是一体化的存在，尤其是思想启蒙对于文学审美的照亮与覆盖更不必讳言，承认这一点乃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五四研究者与继承者的职责所在。但是，认识五四思想启蒙的局限甚至是缺陷，不是为了给反启蒙、抛弃启蒙寻找合理的借口，而是为了使启蒙实现新的思想跃迁。

王桂妹于吉林大学

2010年2月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三种杂志与两个时代	(1)
一 文学:从“点缀品”到“必需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1)
二 革命的“无意”与“有意”——《甲寅》与《新青年》	(24)
三 “革命”与“改良”的吊诡——从梁启超到陈独秀	(40)
第二章 新文学创生与经典确立的原生态场域	(63)
一 创生之路翻译先行:《新青年》中的文学翻译	(63)
二 发掘白话固有的诗性潜能:《新青年》与新诗的生成	(75)
三 伟大经典的“非特别”结构:《新青年》语境下的《狂人日记》.....	(86)
四 “伟大开端”的“去时间化”:《新青年》与《一日》的被遗忘	(96)
第三章 思想的审美之维:新文学中的启蒙景观	(108)
一 东与西:启蒙者的民族话语与性别隐喻	(109)
二 新与旧:“娜拉精神”的时代裂痕	(120)
三 古与今:“旧历”与“新年”的对抗与俯就	(130)
四 启蒙他人与救出自己:启蒙者的忏悔限度	(146)
五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155)

第四章 启蒙话语的洞察与不见	(169)
一 道德株连审美：“大团圆模式”批判的历史功过	(169)
二 被“个性时代”湮没的“个性”：陈衡哲与五四的距离	(184)
三 被放逐的快乐：启蒙叙事下的节俗描写	(201)
四 超前的批判：重审对五四“科学主义”反思的有效性	(218)
附录 《新青年》文学创作、翻译一览表(1—9 卷)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38)

第一章

三种杂志与两个时代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学界已有了极其丰富的阐释，甚至可以命名为“新文学发生学”。本书避开学界已有的古今中外的宏观论述和有头有尾的“历史必然逻辑”，从一个更为具体的微缩景观——与文学革命及其倡导者陈独秀密切相关的三种杂志（《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甲寅》）和两个时代（前五四与五四时代）近距离梳理五四文学革命从“无”到“有”的思想行程、历史归属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名与实。

一 文学：从“点缀品”到“必需品”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中国 20 世纪初期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① 和《新青年》皆由陈独秀主创，虽然都以启蒙为职志，但历史风云变幻的迅捷却使二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风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导向。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驱所创办的这两份杂志，立体而真切地透视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革命性效应。

^① 《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主编。1904 年 3 月在安徽芜湖出版。该报为半月刊，每期 40 页，至 1905 年 8 月，共发行了 22 期。“安徽俗话报影印者说明”，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影印本。

（一）从面对大众到唤醒小众：以退为进的启蒙策略调整

中国自晚清以来急剧呈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所引发的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启动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清末时期民间社会出现的创办白话报热潮正是内置于这一历史脉络当中。尽管各类白话报都分别体现出创办者的不同旨趣和思想倾向，但是以下层民众为启蒙对象，以“开启民智”、“浚导文明”为根本宗旨，则成为清末白话报的总体历史品格，《安徽俗话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具体到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实际更是其矢志不渝的革命活动的一种实践方式。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曾于1903年发表了《安徽爱国会演说》，认为目下要尽力做的是三件事：第一消息；第二思想；第三体魄。“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①“运广长舌，拨动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正是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一个直接动力。《安徽俗话报》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基于此一办刊宗旨，《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②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逸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阶层，而是体现出办报者极为广泛的受众诉求，当然，这尽可以看做是报人的广告宣传策略。与《安徽俗话报》同一时期颇有影响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而且那程度

^① 《苏报》，1903年5月25、26日。

^② 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

可以合着妇女儿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①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依旧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可以滴水见世界，折射出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普遍议事日程。梁启超对这一历史性课题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②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换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③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上，综观《安徽俗话报》全部，“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滞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因此，《安徽俗话报》的开篇“论说——《瓜分中国》”才是启蒙的核心范畴，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消息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意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的危机意识”和“救亡的爱国意识”的延展性话题出现的，向民

① 林獬：《通信》，《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15日（甲辰年四月初一日）。

②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8页。

③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页。

众宣传亡国与救国的大道理才是启蒙的实质性内容。正所谓：“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① 蔡元培的这一评判一语道破了陈独秀的醉翁真意。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无知无识的下层民众移向了精英小众——“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这一名称的改变虽然有其具体原因，^② 但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凸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敝，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注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显然根源于近代以来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做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也。”^③ “青年”被认定是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启蒙的“根本之图”在于改造青年。应该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鲁迅早年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认为“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④ 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

① 蔡元培：《独秀文存·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1月版。

② 据汪原放回忆：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的背道而驰了。——《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③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驱者们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① 1939年，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时候也对于这一启蒙策略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功勋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②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基于自身的历史境遇不断觉悟的过程。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③。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④ 而以“戊戌变法”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正是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则可以算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

①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2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③ 对于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前所经历的思想转变过程，胡明先生有过精审的剖析，见《正误交织陈独秀》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

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国体，但是正如先哲所言：“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但是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①这也正是陈独秀等人所深切体会到的历史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关键时刻，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民主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伦理思想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②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灭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实际却真正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③至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新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因此，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对象由普遍意义的广

①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

③ 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

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而正是这次以退为进的启蒙策略调整也终于导致了从语言到文学的一系列连锁变化。

（二）从俗话到文言：启蒙言说方式的倒转

启蒙策略从“多数”到“少数”的变迁也形成了前后迥然不同的言说方式。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言说方式由训喻转为论争，文字由俗语变为文言，历史似乎发生了一个倒转，但是这种看似退化似的倒转正是启蒙实际的需要。

有学者统计“在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约 140 份白话报刊和杂志。”^① 这一大规模的民间办报热潮，其深层动机自然是中国近代以来日趋严重的亡国危机和由此催生的启蒙浪潮。正是基于这一语境，《安徽俗话报》圈定了自己的读者群：“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各处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② 可见，《安徽俗话报》主创者的意图几乎包揽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宣传难免有为推销报纸而做的广告之嫌，但是陈独秀并非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报商，读者的多寡远非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寻求“启蒙效果”的最大化。既然是面向广大底层民众的启蒙策略，自然使得《安徽俗话报》形成一种“训喻式”的启蒙言说方式。主创者陈独秀正是有感于当时很多日报旬刊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者也矣焉哉”，才下定决心“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③ 从整个报刊所呈现的话语表述方式来看，《安徽俗话报》确实做到了语言的浅近、俗白与亲切。像“瓜分中国”这样一桩普通老百姓不甚明了的亡国

①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34 页。

②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第 1 期，1904 年。

③ 同上。

大道理，陈独秀使用俗语做了生动的解说：“各国人看见中国这样容易欺负，都道中国一定是保不住了，与其把这个肥羊尾子让俄国独得，不如趁早我们也都来分一点儿吧。因此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传的好中国，当作西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① 诸如此类对老百姓而言陌生乃至深奥的政治名词都是以这种活泼生动、妇孺皆懂的话语诠释出来的。

“报纸”作为当时已为社会所认可的有效传媒方式，从形式上本来是以书面文字与读者达成“写—读”的关系，但是限于当时民众的识字和阅读能力，实际所采用的却是“听—讲”的方式。《安徽俗话报》中经常出现“说几件给列位听听”、“列位听着”、“大家请看”一类的字眼，这种设定假想听众的说话方式，一方面是顺应了普通民众熟悉的书场听书的方式；另一方面则与当时“讲读报刊”的社会风尚相关。清末民初，针对下层民众不识字的现状，热心启蒙的有识之士开设了很多“阅报处”，一些“讲报处”（宣讲所）也陆续出现。“讲报”与传统的“说书”实际没有形式上的区别，只有内容上的不同，而有些讲报所实际就设在书场，说书人在说书的同时每天增讲报章数段。与此相关联，报刊的“说话形式”也成了—个潜在的编辑要求。“口语话家常”的方式有效地拉近了启蒙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显得亲切而痛快，记者“讲”到气愤之处，甚至往往会出现“放狗屁”、“王八羔子”之类的村话，显然是照顾到了普通民众的语言习惯和说话方式。尽管《安徽俗话报》是一个地方性报刊，但是陈独秀并没有过多使用本地方言土话，而是尽量使用通用的“官话形式”，从而使《安徽俗话报》的发行并不仅限于安徽一地，而是行销全国，从其所开列的代派处可见：除了安徽省各地，还销往上海、保定、北京、山东、镇江、南京、长沙、南昌等地，销量最大时达到三千多份。正因为看到《安徽俗话报》这种通俗而有效的启蒙宣传方式，才出现了安徽绩溪县官劝人看俗话报的启示：“新出安徽俗话报，门类极多，言词极浅，近来时政，

^① 三爱：《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